

## □ 师友情

边说起孙老师的情况，刘老师也高兴地跟我说，确实好多了！我由衷地为孙老师高兴。6月14日上午，我因参加孩子学校举行的成人礼仪式，将手机调成静音，活动结束后，看到有刘老师9点多打来的电话，赶紧回过去，才得知孙老师已于早晨5点多去世了。

孙老师走了，我对他有很多不舍，十

年的相处使我们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我也为孙老师没能坚持到再回清华园而深感遗憾，我了解他，知道清华园里有他太多的不舍与牵挂！但是，我也为孙老师感到欣慰，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亲人、好友都在身边陪伴他，他走得不孤单！

2014年10月23日

# 愿得此身长报国

## ——缅怀梅祖彦先生

○张光华（1963 建筑）



梅祖彦先生（1992年）

岁月流逝，清华校友总会原副会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梅祖彦先生去世已经12年了。最近从《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中得知，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一座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上刻有包括梅祖彦先生在内的抗战期间从军学生名录。校庆日上午，我满怀感念之情前去凭吊。经在校同学指点，沿大礼堂后面的校河南岸，往东北方向不远，在一块偏僻的空地上，找到

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中，右起第8行第12名为“梅祖彦”，不禁潸然泪下。

从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到1963年毕业，我经常在新水利馆和旧水利馆的教室上课，但并不认识水利系的教师。直到1980年《清华校友通讯》复刊以后，我才在《通讯》上面看到梅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梅贻琦老校长的儿子，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断学业参军抗日，曾担任美军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完成学业，于1954年回到清华任教。但我无缘和梅先生相识。

在我大学毕业30年后，一场意外的灾难使我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是梅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为民请命，才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说来有点话长。

1994年3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怒不可遏。在我工作的某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不但非法克扣我的津贴，还冒领我的

奖金数千元。对所长的行迹不端，大家早有察觉，财务人员揭露出不少更加严重的经济问题。4月初，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两位财务人员提供的真实情况，向部党组及监察部驻部监察局递交了署名举报材料。本来以为人证、物证俱在，问题很容易核实。岂料主管部门明确告诉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时，所长亲自告诉我可以不退住房调走。我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然领导不支持我举报，我也待不下去了。经同学介绍，找到了一个设计单位给我发了商调函。但所长批示必须退住房，这样一来，人事部门就不给我办理调动手续。所长以已有商调函为由，从7月份起停发了我的全部工资，这就逼得我只好背水一战。

那年月，不少单位正忙着改制，国有资产已经面临最危险的时候。我到处上访，却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认真对待。我向财政部大检查办公室举报，他们却答复说我反映的情况都算不上问题。检察院收到举报后没有立案，只是移送到监察部门处理。只有两家报社伸出援手，《工人日报》和《经济日报》先后在“内参”上登了我的揭发材料，但也没有得到任何领导批示。

1995年3月两会期间，我给好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发了信。其中一位代表给我回信说，已经把我写的材料转交给有关部门处理。5月，监察局通知我，由部里组成调查组对所长的问题进行“复核”。没料到查了大半年还是没有结果。

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老伴曾向本院的区人大代表蔡仲德教授求助。蔡仲德教授对我的处境非常关注，由他出面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高层领导递交过多

封信件。转眼到了1996年，根本没什么动静。蔡仲德教授认为，他这个区人大代表的实力还不够强，必须找一位有责任感的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对政府进行监督才行。经他介绍，找到了梅祖彦先生。

这时，两会已经召开，梅先生从代表团驻地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住在亚运村，不好找，让我把写的材料交到三里河他家里，他中午抽空回家去取。我估计，梅先生是担心驻地门口有人挡驾，因此宁愿自己跑一趟。梅先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顿时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天后，梅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把我反映的情况作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提上去了。正是由于梅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才促成了某部于1996年6月发文撤销事务所，这就使有的人想让事务所改换门庭的打算胎死腹中。

由于领导部门迟迟不对事务所的财产进行清算，这就为席卷国有资产提供了可乘之机。我多次到审计署上访，希望他们关注国有资产面临流失，审计署让我回去找部里。但监察局仍然按兵不动，我只好又请梅先生转交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对某部顶风包庇经济违法活动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追究。

我曾多次到府学胡同中纪委、监察部接待室上访。1996年10月，接待人员曾明确告诉我，“这事儿在我们这儿已经了结了”，“笔迹鉴定过了，你是署名举报，你可以找部里看结果”。可是，我找部监察局看笔迹鉴定结果，他们却说不知道。

斗转星移，又拖到第二年的春天。1997年3月初，我再次请梅先生转交一封

## □ 师友情

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重申我的要求。梅先生也再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填写了必须追究责任的意见。

1997年3月底，监察局终于送来了给举报人的《回告信》。这封信避重就轻，对那些涉嫌犯罪的问题不敢核实。对冒领奖金问题，说是“难以认定”，但又含糊其辞地说“给予你一定的经济补偿”。最后留了个大尾巴：“有关经济问题，待审计后处理。”我当即表示对复核结果不服。监察局通知我尽快到主管部门安排的工作岗位上上班，到主管部门财务处领取经济补偿（包括被冒领的奖金和扣发的工资）。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梅先生，他无不遗憾地说：“看来现在也只能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了。”梅先生勉励我“抓紧时间好好工作”。第二年全国人大换届，梅先生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

事务所被撤销以后并未审计财务、收缴账款。所长大约在1997年前后销声匿迹，后来就被主管部门除名。若干年后，一位副部长指示主管部门给他办理退休手续，竟不再提“待审计后处理”的“有关经济问题”了。

恢复工作以后，我用业余时间写材料对《回告信》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把状告到了监察部；连续几年的两会期间，我都给不少领导人、领导机关、新闻媒体以及多位人大代表写过信，都未引起关注。我想，如果有一位收到信的人大代表能像梅先生那样锲而不舍地对政府进行监督，事情的结局也许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据说有一条潜规则，人大代表不介入个案，我没有向梅先生求证过。但按照《宪法》规定，人大代表要“听取和反映人民

的意见和要求”。梅先生在依法办事，也就问心无愧。一个人大代表，毫无利己的动机，执着地以反映群众意见、维护群众权益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爱国主义精神。梅先生受过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熏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崇尚民主与科学、追求社会进步的勇气。

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改革。梅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尽心竭力提出过不少合理化建议（见梅著《晚年随笔》）。梅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对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议》中写道：“为了不产生某些政府人员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政府官员都不应当选人大代表。现在我国民主体制尚不健全，人民代表中还需要一定比重的政府官员，但应当规定政府官员只能作为上一级人大的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大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员就不应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可惜这条回避“自己监督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

我恢复工作和退休以后，每年都要去梅先生家看望一两次。当时梅先生很忙，除了带研究生，还要写书、参加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工作，因此我也从不久坐。闲谈中他感兴趣的是一些知识性的话题。有一次，因为他的朋友的住宅前要盖楼房，担心阳光被遮挡，他就问我建筑设计标准上有些什么规定，和我讨论如何防止违规建筑出现的问题。梅先还生曾问我，他家对面的“四部一会”办公楼是哪四部一会？我答不上来。后来我终于在历史资料中查到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可是梅先生早已乘风归

去了。

梅先生很爱惜清华的名声。当年他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世纪清华》时就指出，这本书编得太马虎，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他把书翻开对我说：“傅任敢一直在大陆，怎么会在名字前面加个[台]？贺麟（1962），一看就不对。老校友看了很有意见。”他让我抽时间好好看看，提提意见。后来我把我写的《读〈世纪清华〉札记》（《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印）给他送去，他看了看，点点头微笑了。

言谈中可以察觉到，梅先生最感到自豪的经历是抗战时期投笔从戎为国效力（他的二姐也参军了，在救护队）。他说，常常有年轻人问他，对当年从美国回来后不后悔？他说当时就是想学成回国为国效力，没什么别的想法，现在并不后悔。从梅先生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表现看，他就是要为国效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梅先生平时身体很好，生活简朴。有一次我陪他到协和医院检查眼睛，他执意要坐公交车，不坐出租车。从东单下车后他走得飞快，我都有点跟不上。他家里没有豪华的装修，家具也很老旧。但是他和夫人从1992年起捐资助学，每年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两名念不起书的孩子。一旦知道孩子家里还遇到别的困难，他们又再寄些钱去应急。总之不愿看到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他们为人低调，不希望受到宣传。有记者来采访，一定要求不要公开他们的姓名。（见《北京日报》2002年9月20日《教授夫妇十年捐资助学》）

2003年春节我去梅先生家拜年，不料得知梅先生因肺癌已住进潘家园的医科院肿瘤医院了。我赶到肿瘤医院，一进病房

刚叫了声“梅先生”，躺在床上看《京华时报》的梅先生一个仰卧起坐动作就坐起来了。他枕头边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梅先生没动手术，在做放射治疗。从外表看，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午饭时的胃口也很正常。梅先生住的是单人病房，每个床位在公共厨房里都配有一个煤气灶位。第二次我去医院看望时就带了一条早上买的活鱼（先在家里加工洗净），煮了一条清汤鲫鱼送到病房里，梅先生兴致勃勃地一口气就吃完了。

后来北京市流行非典，大家都息交绝游了。等到非典警报解除以后，我打电话到梅先生家一问，没想到梅先生的儿子佳禾兄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在5月27日去世了，这令我大吃一惊，痛惜不已。

我到梅先生家他的遗像前含着眼泪行了三鞠躬礼。梅先生的夫人刘自强老师说，过去每次都是梅先生亲自乘公交车去给希望工程捐款，他生前还惦记着今年的捐款没有交。刘老师拿出两千元请我跑一趟替梅先生把捐款交了。我即遵嘱骑车到圆恩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替梅先生给希望工程捐了款。

冯宗璞先生在《晚年随笔·序》中写道：“《晚年随笔》记下的这些事，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归结到爱国。”这个评价很准确。梅祖彦先生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爱国。他爱祖国，矢志不渝。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爱国者。

我常常缅怀梅先生。现在我在清华园里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找到了梅先生的名字，我会年年来凭吊。

2015年6月3日5时